



政府决策与咨询丛书

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研究： 基于主观贫困线方法

曲大维 著

进城流动人口的贫困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全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城市化过程中贫困向城市集中这一现象。运用主观贫困线方法，可以在有限的信息采集下更有效地显示这一群体的贫困特征和主观诉求，从而为流动人口的贫困救助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为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城市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研究——以上海为例”（09YJC840026）最终成果

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研究： 基于主观贫困线方法

曲大维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运用数学方法,研究了流动人口的主观贫困线问题,分析了流动人口主观贫困线及其福利特性,提出完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的政策建议。本书特点在于精确地测度了主观贫困线。

本书读者对象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的管理和研究人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研究:基于主观贫困线方法 /曲大维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49-0

I. 流... II. 曲... III. 流动人口—贫困线—研究—中国 IV. 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6182 号



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研究: 基于主观贫困线方法

著 者:曲大维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154 千字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1949-0/C

定 价:39.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9.25

印 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致 谢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首先课题组要感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张健明院长、于凯副院长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始终关注和热心支持。公共管理系刘志欣副教授、邱梦华副教授、李晗副教授、沈世勇老师、罗晶老师等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给予了我们很多启发和指导,与他们的多次交流使我们更加明晰了研究框架。

感谢调查区和街道工作人员的配合和支持,如果没有她们的帮助,对流动人口家庭的调查将比我们实际进行的要艰难得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2010 级同学在暑期与我们一起完成了流动人口家庭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整理。向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曲大维

作者简介

曲大维，经济学博士，讲师，现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公共政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上海市教委科创项目等十余项课题；出版论著1部，在中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2014年3月至今，担任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前 言

本书在对当前贫困测度研究中越来越被广泛使用的主观贫困线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的基础上,利用“基于主观贫困线方法的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研究”课题的最新调查资料,使用交叉法和回归分析方法测算了上海流动人口的主观贫困线,并深入分析了主观贫困线测度方法中所涉及的等值规模、收入与支出、收入与资产、时间因素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流动人口主观贫困线及其福利特性,进一步完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

全书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为导论,说明了流动人口贫困问题研究的背景以及采用主观贫困线方法进行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的意义所在。

第二章从价值观、外部性、不平等、社会地位、福利、需要满足、能力和权利缺乏以及脆弱性等多个维度重新界定和诠释了贫困的定义。

第三章论述了贫困测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收入和支出指标的优劣、资产、时间等因素在贫困测度中的影响,家庭内部的福利分配问题以及贫困程度测度。

第四章对包括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和主观贫困线等多种贫困线测度方法进行了系统评述和说明。

第五章对贫困测度中的常见指数进行了说明和评述。

第六章根据本课题调查数据以及已有研究的文献整理数据,对流动人口贫困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因素。

第七章是主观贫困线计量模型及测算结果,以及流动人口贫困发生的机理分析。

第八章给出结论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曲大维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和综述	4
1.3 研究对象界定	6
1.4 研究思路和篇章安排	8
1.5 研究方法	9
第 2 章 什么是贫困	10
2.1 贫困作为一种价值判断	10
2.2 贫困与外部性	12
2.2.1 贫困的负外部性	12
2.2.2 贫困的正外部性	13
2.3 贫困与不平等	14
2.4 贫困与社会地位	16
2.4.1 贫困与社会支持缺失	16
2.4.2 贫困与底层阶级	17
2.4.3 贫困与社会排斥	18
2.5 贫困与低福利状态	19
2.6 贫困与未满足的需求	21
2.7 贫困与能力及权利的缺乏	23
2.8 贫困与脆弱性	24
第 3 章 贫困测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27
3.1 收入与支出	27
3.1.1 使用支出变量的依据	27

3.1.2 使用支出指标测度贫困的实证结果	29
3.2 贫困与资产	30
3.3 时间因素的影响	32
3.4 贫困的程度	34
3.5 家庭内部的福利分配	34
3.5.1 家庭内部福利分配问题的复杂性	35
3.5.2 家庭内部福利分配的研究述评	35
第4章 贫困线测度方法	38
4.1 引言	38
4.2 绝对贫困线方法	39
4.2.1 标准预算法(必需品法)	39
4.2.2 恩格尔系数法	40
4.2.3 马丁法	42
4.2.4 食物—能量摄入量	43
4.3 相对贫困线测度方法	44
4.3.1 比率法(比例法)	45
4.3.2 国际贫困标准法	45
4.3.3 扩展线性支出法	47
4.4 主观贫困线方法	48
第5章 贫困指数	51
5.1 贫困指数公理	51
5.2 常用的贫困指数	54
5.2.1 人头指数 H	54
5.2.2 收入缺口指数 I	56
5.2.3 贫困缺口指数 PG	57
5.2.4 Sen 指数 S	58
5.2.5 FGT 指数	59
5.2.6 Watts 指数	60
5.3 多维度贫困指数	61

5.3.1 人类贫困指数 HPI(Human Poverty Index)	61
5.3.2 多维贫困指数 MPI(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63
5.3.3 Ch-M 指数(Chakrava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65
第6章 流动人口贫困状况的基本描述	67
6.1 流动贫困人口的规模	67
6.1.1 一个参照背景:城镇户籍贫困人口规模	67
6.1.2 流动贫困人口的规模	69
6.2 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70
6.2.1 人口学特征	70
6.2.2 流动人口来沪原因	71
6.2.3 社会支持状况	71
6.2.4 主观幸福感	72
6.2.5 社会保障	73
6.3 流动贫困人口的收入与支出情况	75
6.4 流动贫困人口的居住状况	77
6.4.1 流动人口的居住现状	78
6.4.2 居住现状对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	82
6.5 流动人口的教育状况	84
6.5.1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现状	84
6.5.2 农民工的培训现状	88
6.5.3 流动人口的教育状况对贫困的影响	90
6.6 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	92
6.6.1 流动人口的健康现状	92
6.6.2 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对贫困的影响	97
6.7 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	98
6.7.1 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	98
6.7.2 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对贫困的影响	101
第7章 流动人口的主观贫困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03
7.1 当前流动人口贫困度量中存在的问题	103

7.2 流动人口的主观贫困线	104
7.2.1 模型	104
7.2.2 计算结果	105
7.3 流动人口贫困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106
7.3.1 制度排斥	107
7.3.2 政策因素	108
7.3.3 城市管理制度的局限	110
7.3.4 流动人口自身的因素	111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113
8.1 研究结论	113
8.2 政策建议	114
8.2.1 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	114
8.2.2 加大就业促进政策对流动人口的扶持力度	116
8.2.3 加强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和职业培训	117
8.2.4 加强流动人口的健康医疗服务	119
8.2.5 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和居住质量	121
8.2.6 丰富贫困测度方法	122
附录 上海市流动人口生活状况调查	123
参考文献	125
索引	135
致谢	138

第1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尖锐问题之一,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当今世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贫困问题都是共同面对的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富裕中的贫困是我们这个世界中最大的挑战”,需要用“满腔的激情和专业化的手段来与贫困作斗争”^①。

在过去近 30 年里,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的进展令人称赞。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惊人的成就殊为不易。众多指标都表明,中国在该领域的进展十分显著。按照官方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 1981 年的 18.5% 下降到了 2004 年的 2.8%,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 1.52 亿下降到 2600 万。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按 2003 年农村价格计,平均每人每年 888 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扶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 1981 年到 2004 年,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 65% 下降到 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6.52 亿降至 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按照国际上按平均每人每天 1.25 美元的新贫困标准(按中国 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贫困水平会高一些,但是自 1981 年以来,贫困的下降幅度依然显著(从 1981 年的 85% 下降到 2004 年的 27%)。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段时间内,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15 亿减少到了 11 亿(世界银行,2005b)。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

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衡量,贫困率均大幅度下降。在实现人类发展指标方面

^①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 Attacking Poverty.

取得的成就也十分巨大。对于新世纪发展目标而言,中国大多数都已达到,或者成绩斐然。由于这些已经取得的进步,与20世纪80年初的改革初期相比,中国现已步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贫困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突破。研究者从贫困规模的度量、贫困产生的原因、影响贫困变动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等众多方面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例如:魏众,1998;唐钧,1998,2002;Khan和Riskin,2001;Park和汪三贵,2001;蔡昉等,2002;李实和Knight,2002;亚洲开发银行,2003;Giles等,2003;林伯强,2003;孟昕,2004;李实,2004;Shujie Yao等,2004;王德文和张恺悌,2005;薛进军,2005;Khan,2006;夏庆杰等,2007;等等)。

在以上众多的研究中,城市贫困线的确定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确定城市贫困线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用于贫困问题的诊断;另一个是具体用于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Hussain,2003)。尽管由于现实约束,用于后一用途的贫困线往往与理论上的贫困线有较大的脱节,但确定一条诊断性的贫困线仍然对我们从较广阔的视野观察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贫困线的确定上,当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使用最多的是绝对贫困线方法或相对贫困线方法。诚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背景下)绝对贫困线方法和相对贫困线方法是最有经济效率的,但这两种方法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决定了这种划分方式不能覆盖贫困人群的全部特征。不仅如此,社会福利政策本身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还要考虑政策作用对象的精神和心理因素,而客观指标在揭示人们需要(不同于需求)和偏好方面,所能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往往十分有限,因而需要通过民意调查补充相应的主观信息(Veenhoven,2002)。主观贫困线方法强调贫困的个人对于自身福利状况的判断,因而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对前述的“客观”贫困度量方法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一点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虽然有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了运用主观贫困线方法研究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尝试,但迄今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凤毛麟角,本项研究旨在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探讨主观贫困线方法在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中的适用性、其自身优化的方法以及主观指标所描述的贫困人群的需要和偏好特征对于完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体系的意义。

同时,有的大部分研究讨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城市户籍的贫困人口,而城市中

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其贫困程度甚至可能高于户籍人口中最贫困的那一部分(Gustafsson, 2004)。现在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对于流动人口贫困问题的关注基本上是从宏观层面(如社会保障体制完善)出发,缺乏对于这一群体的贫困状况的具体的调查和分析。对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贫困问题考察的缺失,有很大可能会导致对城市总体贫困率的低估(Gustafsson, 2000; Khan 和 Riskin, 2001; 蔡昉等, 200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贫困现象将越发凸显并将成为城市贫困救助政策体系所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

在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政府以及研究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上,而忽略了城市贫困阶层中另一个庞大的群体——进城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进城流动人口(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民工)的贫困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全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城市化过程中贫困向城市的集中这一现象,根据世界银行 Martin Ravallion 对 39 个国家的农村与城市贫困人口比较研究以及对于印度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贫困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要快于总体人口的城市化速度^①。而世界银行的估计是,在拉丁美洲和东欧,目前已有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在未来的 20 年时间内,这一现象也会出现在亚洲和非洲。^②

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其家庭收入消费等客观指标的收集往往具有很大的难度,而运用主观贫困线方法,可以在有限的信息采集下更有效地显示这一群体的贫困特征和主观诉求,从而为流动人口的贫困救助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本项目将力图填补国内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有鉴于此,本研究要解决的正是在收集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微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其贫困状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测度。

上海作为一个吸引流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型城市,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早的试点城市,其城市贫困救助政策体系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未来可能的居留和沉淀,如何稳步地扩大城市贫困救助政策的覆盖范围将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本研究也将为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推广到全国其他城市)流动人口贫困救助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① Martin Ravallion. On the Urbanization of Poverty. Working Paper, WorldBank, 2001.

^② World Bank. Urban Development Division, Cities in Transition : A Strategic View of Urban and Local Government Issues, 1999.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和综述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多数应用主观贫困线方法的研究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Van Praag 等(1982)和 Hagenaaars(1986)用 LPL 方法对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 8 个欧盟国家(每个国家 3 000 户样本)的 IEQ 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了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特征的社会群体之间的 LPL 贫困线,发现在同一国家之内,大城市居民的 LPL 贫困线更高;同一城市之中,户主具有大学学历的家庭 LPL 贫困线最高,户主是退休老人、低学历者、工人或农民的家庭 LPL 贫困线最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生活成本效应和环境参照效应。

Colasanto、Kapteyn 和 Gaag(1984)利用 Wisconsin Basic Needs Study(BNS) 1981 年的数据研究了主观贫困线方法在美国的适用性。在这一研究中,他们同时使用了 LPL 贫困线与 SPL 贫困线,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情况与欧洲非常相似,只是美国的最低收入回答和贫困线略高于欧洲。同时,研究也发现个人的主观贫困线受到了收入和消费的社会参照群体以及他的以往收入(习惯)的影响。

Danziger 等(1984)利用美国 ISDP(Income Survey Development Program)的 1979 年数据,使用 MIQ 问题调查结果推导出 SPL 贫困线,研究结果发现 SPL 贫困线要高出美国官方统计方法下的贫困线,并且被调查家庭最低收入回答的结果受到儿童数量、户主年龄和性别、就业状况、食品补贴和住房补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其很小的调查成本(在普通的调查中加入一个 MIQ 问题)相比,SPL 贫困线方法带来的收益是十分可观的。

De Vos 和 Garner(1991),Garner 和 De Vos (1995)利用美国 1982 年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CES)估计了 SPL 贫困线,该研究首次检验了固定支出(fixed expenditure)与 MIQ 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年龄、教育、性别、地区、固定支出以及调查近期是否发生收入变动等因素对于 MINQ 结果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将美国结果与荷兰进行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美国 MINQ 结果的收入弹性略小但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效果更明显。两国的 SPL 线均高于各自国家的官方贫困线,但美国 SPL 线偏离官方贫困线的程度更大。

Garner 和 Short (2003)利用美国 SIPP(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1995 年数据进行的研究中,在使用 MIQ 的同时,还引入了最小支出问

题 MSQ(Minimum Spending Question)。研究发现最小生活成本问题的语言表述方式对于被调查者的回答起到重要的影响,即由 MIQ 推导出的 SPL 贫困线要高于由 MSQ 推导出的贫困线。对于发达国家主观贫困线的研究还有 Saunders 和 Matheson(1994)关于澳大利亚、Halleröd(1995)关于瑞典、Schröder 和 Schmidt(2005)关于德国的研究,等等。

由于对收入界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主观贫困线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还不多见。Pradan 和 Ravallion(2000)对于牙买加和尼泊尔的研究是主观贫困线方法首次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下得不到合理的 MIQ 回答的问题,他们采用了一种混合方法,即综合性调查的基础上增加询问人们对于各项消费的最低满足量,并以此估计出只包括食品的 SPL 线和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的 SPL 线。结果发现,两国整体的主观贫困线都与各自的官方已有的“客观”贫困线比较接近而分地区的主观贫困线则与官方已有的“客观”贫困线有较大差距。而与客观贫困线下反映的不同,规模大的家庭并没有比规模小的家庭更具有贫困倾向。

Gustafsson 和李实等(2004)首次将主观贫困线方法应用于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之中,他们利用 1999 年中国 12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得到了 SPL 贫困线,研究结果发现这条 SPL 贫困线与官方估计方法下得出的贫困线非常接近。不同城市之间,贫困程度以及被调查对象对于“维持生活的最小需要”的看法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SPL 贫困线所反映的中国城市贫困状况与家庭的教育水平、年龄段、职业状况等因素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关联。

Bishop, Luo 和 Pan(2006)在研究 1988 年到 1995 年中国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期间的地区贫困变动情况时,利用 SPL 贫困线方法对中国主要地区(沿海、中部、东北和西北)的贫困状况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描述,发现从 1988 年到 1995 年各地区的贫困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88 年主要地区之间的贫困差距很小,其中东北地区的贫困率最高;到 1995 年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贫困率显著降低而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贫困率没有发生明显的下降。在这项研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首先,由于他们所使用的 CHIP(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数据在 1988 年并不包含 MIQ 问题,因此 1988 年的 SPL 贫困线是通过 1995 年的贫困线和家庭规模均等比例(equivalence scales)并剔除了通货膨胀效应得到的;其次,针对主观贫困线方法中可能产生的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维持生活最低成本的不同评价,他们使用了生活成本指标进行购买力差别的调整;最后,衡量贫困率采用的是对贫困变

化更加敏感的 Sen 指数。

Gustafsson 和岳希明(2006)利用 2003 年中国 22 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数据所做的农村居民对于贫困的理解的研究中,将 MINQ 问题转换为了两个问题,即询问农民谷物的最小需求和现金的最小需求,通过估计反应函数推导出一条 SPL 贫困线。研究发现:SPL 贫困线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低收入线(高于农村贫困线)非常接近;农民对于维持生活最低收入的估计受到他所在县城的平均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平均收入高的地区农民所需要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更高从而更具有贫困的主观评价倾向;贫困风险随年龄的增加及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陈立中和张建华(2006)利用武汉等 7 个城市的家庭和个人调查数据,以交叉法和回归分析测算了 7 个城市的 SPL 贫困线,实证结果表明除地区变量、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年龄、失业和健康状况等因素能够显著影响主观贫困线。

通过归纳以往有关主观贫困线方法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首先,由最小生活成本主观评价的调查数据转为反应(效用)函数进而估计主观贫困线的基本方法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收入指标之外引入其他因素(如消费等)是否能够使基本方法优化或者在某些研究背景下使基本方法优化,还缺少足够的研究。

其次,虽然实际研究中大多使用 SPL 贫困线,但 LPL、SPL 和 CSP(及其改进)方法之间的比较和综合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主观贫困线方法在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面板数据的出现和应用,这种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城市贫困人口特征的把握。

第四,关于中国城市主观贫困线的以往研究都是针对户籍人口,将主观贫困线方法应用于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1.3 研究对象界定

流动人口概念繁多,目前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角度与目的不同,赋予了流动人口不同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依据流动人口产生的根本原因来给流动人口下定义,将流动人口理解为不改变常住户口进入某一地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一般称为民工、农民工、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等。

(2) 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将流动人口看成是人口空间迁移变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发生短暂流动行为的那部分居民,他们并没有改变常住地,一般被称为短期迁移人口、暂时性迁移人口等。

(3) 从行政管理角度出发,依据是否有某一地常住户口为指标来确定流动人口,认为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行政范围内滞留但没有常住户口的那部分人口,一般被称为暂住人口、人户分离人口等。

以上是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流动人口下的定义,国际上与流动人口有关的一些概念与定义主要有:

(1) 人口移动,指人口在空间或地域位置上的一切移动。依据这个定义,只要空间位置发生变动,不论人们出于何种原因发生移动,均属于移动人口,这与我国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定义流动人口相类似。

(2) 迁移人口,指为改变居住地而进行的跨一定区域界限的人口移动,以一定的时间作为人口迁移的标准,一般以移入某地一年以上为准,而我国是以改变户籍为准。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对流动人口下的定义,流动人口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人口的空间位置是否发生改变,并以跨越一定界限为标准;二是户籍是否发生改变。综合以上两点,流动人口概念可概括为无当地常住户口、滞留一天以上并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即为流动人口。

本书中所指的流动人口,又称外来流动人口,是指满足以下条件的调查对象:

- (1) 非上海市户籍;
- (2) 在沪累计居住时间不少于6个月;
- (3) 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该人群占全部流动人口调查对象的比例不应少于90%;
- (4) 以有7岁以下(不含7岁)同住子女者为宜;
- (5) 有无组织依托不限,可以是工作或者居住在上海的流动人口;
- (6) 下列人员应予以排除,包括外籍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人员及以旅游、出差、探亲、访友、就医、疗养、培训、求学等为目的的来沪人员。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1年5月到7月间,课题组在上海市所开展的贫困流动人口家庭和个人调查。样本范围覆盖上海了嘉定区、闵行区和浦东新区三个区,菊园新区、三林、张江、七宝等九个街镇(见表1-1)。

在抽样方法上,先确定区一级的选取,我们主要考虑到了流动人口分布较多的